

连接翻译的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

---《探索翻译与认知的情境交互》介评

许可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DOI:10.12238/mef.v4i4.3516

[摘要] 由Ehrensberger-Dow和Dimitrova主编、John Benjamins出版社出版的《探索翻译与认知的情境交互》一书精选7篇论文,探讨翻译行为(认知过程)与翻译事件(社会过程)的交互。全书在这一鲜明的主题下,分别涉及了机构管理、技术运用、译员本身三个主题,阐述了翻译认知过程与社会过程不应具有严格的界限,而是统一的有机体。本文对书中所有论文进行逐一介绍,并做出简要评价,给出未来这一领域发展的展望与建议。

[关键词] 翻译行为;翻译事件;认知过程;社会过程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Connecting Cognitive and Social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 Book Review on *Exploring the Situational Interface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Ke Xu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Exploring the Situational Interface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edited by Ehrensberger-Dow and Dimitrova, is a collection of 7 carefully chosen papers exploring the interface of translation act (cognitive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event (social process). The collection features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e translators themselves, in order to expound the central idea that there should not be a strict line between translation cognitive process and social process, for they are a unified organism.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and evaluates each article, and provides research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translation act; translation event; cognitive process; social process

翻译研究中似乎已形成两种隐形的阵营,一方研究翻译认知,即翻译过程中人脑的运作情况;另一方研究处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翻译活动(Dimitrova & Ehrensberger-Dow, 2016)。Chesterman (2009)提出译者研究,并将其进一步分为译者的文化、认知和社会研究。研究翻译认知的学者讲精力集中于探索译者决策过程、认知资源调动与分配等,很少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主题之下探讨,或者认为这些认知规律可以适用于大部分情景化的翻译活动。而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学者认为翻译活动无法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翻译活动与目的、读者、客户、原文等情境息息相关,

社会机构会影响翻译的选择、生产与传播,继而影响翻译策略的使用(Wolf, 2007),因此在探讨翻译活动的规律时必须考虑情境。情境不同,翻译活动或翻译过程都有可能不同。随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以及认知科学中新潮流——情境性、体验性认知(Situated and Embodied Cognition)的发展(Risku, 2010),Toury (2012)所区分的翻译行为(即翻译认知过程)与翻译事件(即翻译社会过程)之间并非、也不应该具有严格的界限。Pöschhacker (2004/2016)认为情境认知是口译研究中前途光明的新领域。John Benjamins旗下的学术期刊Translation Spaces于2016年出版了

主题为《认知空间:探索情境交互》的一期。这一期基于2015年7月于巴西举办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国际协会(IATIS)大会的讨论,以及后续的论文征集。2018年,出版社将这一期编辑成为图书重新出版。本书对这两者之间的交互和融合从理论探讨到实证研究均有详细讨论。全书共8篇文章。

1 内容简介

1.1 认知空间:探索情境交互

本文为编辑的开篇介绍文,讲述可能对认知和情境层面皆产生影响的职业口笔译最近的发展,聚焦于三个方面:信息及通信技术对工作流程的影响,口笔译工作的整体组织形式,个人口笔译

译员的工作情境;其次对书中另外7篇文章就翻译行为与翻译事件的交互做出简要评价。

作者提出信息技术对口笔译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笔译已变成了人与电脑的密集互动,译员会为了适应语言技术的约束而改变认知过程,包括更偏向逐句翻译。翻译技术也改变了笔译工作场所的工作流程。口译员向来使用许多技术和设备,但技术出现问题时(如延迟)会给他们增加认知压力,继而对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口笔译员所处的这种社会-技术系统可以被认为他们专业活动中认知和情境方面的交互。在探讨翻译工作的整体组织形式时,作者总结口笔译工作主要由语言服务提供者(翻译公司)来提供,连接客户和译员。实际的翻译工作会经过众多转包和外包。

1.2处于认知与情境的交互之处——医疗背景下的翻译

文章介绍了Gentt团队在两所西班牙医院的肿瘤科帮助提高医患书面沟通的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发现医疗情境下的书面沟通和翻译十分复杂,而且效果不佳,患者对病历上的信息无论是格式还是内容都不满意。研究使用了量化和质化的研究方法,引用类别(genre)这一概念来设计病历的创建和翻译平台,并确定了8种类别:患者指南、事实列表、漫画、海报、儿童故事、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信息说明书,以便护士、医生、心理学家、译员、患者等相关方可以先选择类别,再撰写、翻译或查看具体内容。并且不同的类别也对应不同的术语专业程度,方便译员根据自己擅长的领域来选择和翻译,可以应对翻译行为中遇到的困难。类别的概念可以将语言、认知、背景结合起来,利用翻译研究来应对专业医学背景的沟通问题,即为患者提供合适的信息格式,设计两套术语工具(专业和流行)供译员和专业医学作者使用。

1.3体验式翻译(Translate Live)以创造新知识

一名积极分子翻译项目的案例研究

本章研究了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袁天鹏,其不仅翻译书籍,还成立了工作室致力于在中国推广这本书所倡导的开会规则。研究者选择了安徽省南塘乡为研究对象,对当地接受过袁天鹏培训的村民进行了访谈,并研究了相关的文献,发现袁天鹏在培训时不仅阅读翻译的书稿,或对其进行视译或讲解,还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包括将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改编和简化,对其进行演示,以方便村民理解和掌握。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翻译行为,称为体验式翻译。这种翻译模式超越了Jakobson(1959/2000)提出的语内、语际、符际三种翻译模式,也重新定义了译员的角色,译员不仅仅做翻译,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1.4多语机构背景下的文本创建——译员参与合作体系

本章考察了欧盟委员会的翻译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for Translation)对《欧盟官方期刊》进行文本创建和翻译的过程。研究发现在翻译总局中文本编辑和翻译是共同进行的,译员参与合作体系,他们的工作对于原文本很重要,有可能会改变原文内容。欧盟作为一个多语言机构,其内部所有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官方文件需要由所有语言呈现。在文本创建和翻译中,译员的反馈对文本的创建和修改产生影响,原文本并非拥有至高的不可撼动的地位。文本创建与翻译之间相互依存。

1.5情感作为连接中介——译员的体验自我作为社会和认知的交互

本章使用心理学中的情感(affect)概念(此处特指译员的情感)来作为连接翻译认知和社会行为的中介。情感在这里被理解为意义构建的表示(embodied meaning-making),它是个人的体验自我,而这种体验自我来自社会情境,由社会情境所引起。因此情感同时是个人和内部的,也是集体和社会的。这一概念在翻译学中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理解翻译行为和翻译事件的联系。探知人的情感经历可以使用物理方法,比如观察人的面部表情、行为,测量身体指

征,如心跳、瞳孔、体温等。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叙述来探知。使用物理方法无法了解意义建构的过程,会失去社会属性,而这正是本研究的焦点之一,因此作者认为使用叙述方法来探究情感更为合适。

1.6口译服务供给动态系统中机构的工效学影响

作者从工效学(ergonomics)的角度研究了英国公共服务口译系统中一家叫Insight的公司,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包括对公司工作流程的观察记录、参加和观察会议及入职培训、研究公司网站,对译员做调查问卷、对经理和译员做半结构化访谈。工效学研究人与其他社会技术体系的互动,目的是能够提高人在工作中的福祉以及系统的整体表现。该研究明晰了机构管理对译员实践产生的影响,并调查了译员所感受到来自机构的制约。

1.7职业笔译过程中的自动语音识别系统

作者探讨了在职业笔译过程中使用Dragon NaturallySpeaking这一语音识别软件所带来的影响。作者使用了调查问卷和观察性实验的实证研究方法,发现自动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软件可以创造更加灵活、以译员为中心且工效高的工作流程和工作空间。在译前准备阶段,译员如果收到了无法编辑的源文件,则语音识别软件对于他们来说便是不可或缺的。在正式翻译阶段,语音识别软件用于转录译文,且精确度逐步提高。但相对于传统使用键盘键入译文的形式,借住语音识别软件转录的译文质量可能不够高,需要后期更加认真审校。

1.8哪些模型的过程?——关于翻译行为和翻译事件的认知隐性

在这篇理论思辨的文章中,作者Munoz对Chesterman(2013)根据Toury(2012)对翻译行为(认知过程)和翻译事件(社会过程)区分的论述做出反驳,且逐一反驳了Chesterman根据Toury的翻译中三个问题(2012,第二章)所给出的三个模型:虚拟过程(virtual)、逆向工程过程(reverse-engineered)、

实际过程 (actual)。作者详细论证了 Chesterman 在每个过程模型下举的有些例子为何不妥, 继而提出翻译行为和翻译事件之间不是完全分离的, 而且也不是互补关系, 更像是硬币的两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将认知过程认为是脱离背景、独立、中立的过程, 然而事实是认知过程来自人脑与环境的互动, 认知过程也同时会影响环境。作者得出结论, 应建构一个新的翻译过程模型能够结合认知与社会文化背景。

2 简要评价

本书选择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翻译中情境与认知的交互, 并从多个角度说明一个核心观点: 翻译的认知行为和社会文化情境并非是严格意义上分裂的, 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这一主题下的文章重新结集出版可以进一步引起学界对该主题的注意与重视, 以求更加全面、客观地探索翻译现象背后的规律。本书主要有五个特点:

2.1 研究视角广泛且新颖

本书第二章至第七章这6个研究可归纳为机构管理 (二、四、六章)、译者 (三、五章) 和技术运用 (七章) 三大视角。具体来讲, 第二章涉及医疗体系中对电子病历系统的管理, 以方便医务人员、患者、译员更好地进行书面沟通。第四章将焦点放在欧盟作为一个独特的多语言机构, 其文本创建和翻译成为一个互相作用的有机体, 这也是机构管理所带来的影响力。第六章关注翻译公司规章制度对口译员的限制。第三章和第五章分别探讨了译者本身角色的创新以及译者的情感因素。第七章探讨自动语音识别这一具体技术的应用。这三个视角广泛地覆盖了翻译活动中的部分对象, 说明无论是机构、译员本身还是技术都可以作为连接认知和情境的中介。

2.2 选题包含近期译学热点, 互相有逻辑联系

比如第三章的研究可以从特殊译者行为的角度进行探讨, 特殊译者行为可归属于译者行为研究, 这是近期国内的

研究热点 (周领顺 2019), 也是国内在翻译学领域建立原创性理论的一个分支。“广义上的译者行为会在翻译活动中借翻译表现译者个人的意志” (周领顺 2013), 本研究中译者袁天鹏借助翻译来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便包含着很强烈的个人意志, 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示、成立公司等方法提高译作在中国的传播效应。再比如第五章对译员情感的研究可与焦虑、情绪等研究分为一类, 均为翻译的传统心理学研究, 区别于认知和神经心理学。相对于传统心理学研究, 认知和神经心理学与翻译的结合更具规模, 尤其对于口译来说, 最初比较有影响力的口译研究许多都来自于认知心理学家, 如 Gerver (1975), Chernov (1979)。但翻译的传统心理学研究也十分有意义, 尤其对于口译这种高压的工作, 对心理运作规律的了解可以帮助译员调节工作中的情绪, 更好应对压力, 出色完成任务。或者也可像作者这样将情绪情感做为一个窗口来了解其他事情, 比如技术对译员带来的影响。技术的使用、在大型企业中翻译工作流程专业化等都是现代翻译专业发展和变化的特点 (Ehrensberger-Dow, Dimitrova, Hubscher-Davidson, & Norberg, 2013a), 这些社会性变化对翻译认知带来的影响是本主题探索的关键。本册文章的选择也基于技术和流程的变化等因素。

2.3 选题包含对传统范式和权威的挑战, 值得鼓励

第四章研究的翻译与原文共同创建的欧盟实践说明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生成和传播行为, 已经在特殊语境下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原文, 突破了既往原文与译文二元矛盾、彼此对立的观念。而在译学界, 二元对立的观点仍然大行其道, 不仅是原文和译文对立, 还有“归化”“异化”“显性”“隐性”等概念 (许钧、周领顺 2015)。这种二元对立无法反应客观事实, 二元对立的思想也应该摒弃。

2.4 对其他翻译研究带来一定启示

长久以来, 翻译认知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似乎已形成了两个流派, 彼此兼

容较少。而本书代表着译学界另一个观点, 即起于上世纪80年代联结主义的情境认知 (Pöchhacker, 2004/2016), 这两个流派无需也不应互不来往, 未来研究无论从哪个视角或哪个焦点切入, 都应同时考虑认知和情境因素。另外, 认知过程需要有载体, 可以通过翻译事件来呈现, 通过译员的社会属性或者与技术的互动来呈现。第一、五、七章都涉及到的技术与译员的互动。技术的初衷是帮助译员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译员优化认知过程。但现在情况是有些技术设计界面不够友好, 或者译员认为学习使用技术太难, 甚至为了适应技术而改变自己的认知习惯。因此技术有时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反而阻碍了翻译活动的进行。

本书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 部分研究的深度不足, 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不明确。如第六章通过工效学研究机构对口译员的影响, 研究结论对已有知识或译员的实践并没有太多贡献。工效学框架包括工作场所的环境、认知和组织方面, 笔译的工效学研究发现微小干扰可能会对翻译过程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到译员对工作的满意度和健康 (Ehrensberger-Dow & Heeb, 2016)。但本文对口译的工效学研究所关注的内容与翻译的机构运作或工作流程大同小异, 而机构的运作和工作流程在译学界一直为人们所研究和讨论, 若想从工效学的角度分析, 还可更深入。第七章仅是一项简单的语音识别技术在笔译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并未更深刻地分析技术对译员认知过程带来的影响, 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不明确。其次, 选题范围不够全面, 口译主题偏少, 选题范围不全面。翻译中认知和情境的交互还可以从许多其他角度探讨, 比如翻译史、翻译教学、翻译产品等。

[参考文献]

[1] Buzelin H. Translations "in the Makings"[C]. In M. Wolf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7.

- [2]Chernov G.V.Semantic Aspects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J].Language and Speech, 1978,22(3):277-295.
- [3]Chesterman A.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J]. Herme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9(42):13-22.
- [4]Chesterman A.Models Introducing of What Processes?[J].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2013,8(2):155-168.
- [5]Dimitrova B.E.and Ehrensberger—Dow M. Cognitive Space: Exploring the Situational Interface[J]. Translation Spaces, 2016,5(1):1-19.
- [6]Ehrensberger—Dow M., Dimitrova B. E., Hubscher—Davidson S. and Norberg U.Introduction[C].In M.Ehrensberger—Dow, B. E. Dimitrova, S. Hubscher—Davidson & U.Norberg.Describ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cts and events. 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2013a.
- [7]Ehrensberger—Dow M.,Dimitrova B. E., Hubscher—Davidson S. and Norberg U. Describing 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C].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3b.
- [8]Ehrensberger—Dow M. and Heeb A. H. Investigating the Ergonomics of a Technologized Translation Workplace [C].In R.M.Martin.Reembedding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9]Gerver D.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J]. Meta:Journal des traducteurs,1975,20(2):119.
- [10]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C]. In L.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Routledge,1959/2000.
- [11]Pöschhacker F.Models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2016.
- [12]Risku H.A Cognitive Scientific View 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Do embodiment and Situatedness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J]. Target, 2010,22(1):94-111.
- [13]Risku H.and Windhager F.Extended Translation:A Sociocognitive Research Agenda[C]. In M. Ehrensberger—Dow,S.Göpferich & S.O'Brien. Interdisciplinarity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ocess Research.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15.
- [14]Touy G.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 [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15]Wolf M.Introduction:The Emergence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C]. In M. Wolf & A. Fukari.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2007.
- [16]许钧,周领顺.当前译学界应该关注的若干倾向[J].山东外语教学,2015(4):96-100.
- [17]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行为”和“译者行为”[J].外语研究,2013(6):72-76.
- [18]周领顺.译者行为研究十周年:回顾与前瞻——兼评“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J/OL].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1(02):21-34.

作者简介:

许可(1989—),女,汉族,北京人,讲师,2018级翻译学专业博士在读,研究方向:口译认知及语料库口译研究。